第 24 卷 第 2 期 物 理 学 报 Vol. 24, No. 2
1975 年 3 月 ACTA PHYSICA SINICA March, 1975

儒法两条路线的一场大辩论——读祖冲之《辩戴法兴难新历》[1)]

清华大学 力学教研组 数学教研组 理论小组

公元 464 年，在南朝宋孝武帝时，展开了一场关于历法问题的大辩论．这不是一般的学术辩论，而是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在科学技术领域内的深刻反映．斗争的一方是站在法家立场上创造新历的我国杰出科学家祖冲之．另一方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反对新历的代表人物戴法兴．斗争的实质是主张革新前进还是坚持守旧倒退；主张唯物主义还是坚持唯心主义的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祖冲之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卓越的贡献．他在天文、历法、数学、机械等方面都有发明创造，尤其在编制新历法(《大明历》)和圆周率的精确计算方面更为突出．由于生产的推动，历法研究和机械等方面的需要，祖冲之精确计算出圆周率值介于 3.1415926 和 3.1415927 之间．一千多年以后，欧洲才有人计算出这样高的精度．祖冲之还根据前人观测的天文记载，总结历史上各种历法的成就，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改进了计算闰月的方法(将原来 19 年有 7 个闰月改为 391 年有 144 个闰月)，特别是第一次将岁差的概念用于历法，创制了一部《大明历》，其精确度比旧历更高．

公元 462 年，祖冲之创制《大明历》后，上书宋孝武帝，建议颁行．宋孝武帝纠合了一批所谓学识渊博的御用文人和大臣，以审查历法为名，对祖冲之进行百般刁难和围攻．其代表人物便是皇帝的宠臣、总管朝政的权贵戴法兴．祖冲之面对这样的人物，毫无惧色，据理力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辩戴法兴难新历》一文便是这场大辩论的记载．透过这场辩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思想是怎样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而法家思想又是如何通过与儒家思想作斗争，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这篇记载虽已时隔一千多年，现在读起来，仍然洋溢着法家思想强烈的战斗气息，充满着小人物敢于向老古董开战的反潮流精神．

一

以孔老二为代表的儒家，都是法古倒退的顽固派，他们反对革新，反对前进，力图扼杀一切进步的新生力量．戴法兴继承了儒家的衣钵，接过"法先王"的破旗，极力反对祖冲之的历法改革．他认为古人制造的章法是十九年七闰，这是标准．纵然它与日影观察结果不符，也不许改革("古人制章，立为中格．年积十九，常有七闰．晷或盈虚，此不可革")．

1) 《宋书·历志下》．

他攻击祖冲之改变了置闰章法，便是“削闰坏章”，大逆不道．其实祖冲之第一次将“岁差”概念用于历法，这正是“前法所略”，旷古未有的事．根据岁差现象，这一年的冬至到下一年的冬至，地球绕太阳旋转不到一个整圈，因而每年冬至时的太阳也不在一个固定的方位．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戴法兴所坚持的“古历冬至皆在建星”的“万世不易”的法则．孔老二因惋惜周礼衰败，看见酒杯变了样子也要哀叹一番．戴法兴这个孔老二的信徒，对于历法上这样破天荒的改革更是暴跳如雷，破口大骂为“诬天背经，乃至于此”．

对于戴法兴复古倒退的儒家思想，祖冲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祖冲之明确指出，不能盲目迷信古人（“不虚推古人”），不能以古非今（“不可信古而疑今”），而要“兼今”之长．祖冲之总结了前人的十一个历法，根据前人天文记载和自己亲身实践的大量事实，指出旧历“乖远”已很显著，就应当“改易”，坚决主张“革新变旧”，祖冲之“撰正众谬，理据炳然”．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戴法兴理屈词穷，竟然大耍无赖．蛮横地认为：即使旧历不合理，也“不可革”，要“永当循用”．祖冲之严加驳斥：“岂得信古而疑今?!”如果旧历法简陋有错，也要永远循用，按照这种谬论，你戴法兴是不是要将古时的四分历[1]用于当今，那有这样的道理?!（“若古历虽疏，永当循用，谬论诚立，则法兴复欲施四分于当今矣．理容然乎!”）给了戴法兴一记响亮的耳光．

按照这些反动儒生们的哲学，古代没有的现在不能有，古代有的现在不能改，即使是错的也要千秋万代地错下去，人类不能发展，社会不能前进，否则就是“诬天背经”，大逆不道．果真如此，那就只有将这些腐儒们赶回到穴居野人的上古时代去才合乎他们的道，合乎他们的经．其实，这些孔老二的信徒们，“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过着极端腐朽奢侈的寄生生活，那里肯回到上古时代去过那种自食其力的原始人的生活呢!孔老二宣扬法古倒退，其目的是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变革，实现其“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复辟美梦．而地主阶级顽固派的代表人物戴法兴鼓吹今不如昔，反对变革，其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反对历法改革，而更重要的是妄图用儒家思想统治人民，反对革命，以巩固其豪门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但是，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戴法兴所极力反对的新历，经过曲折的斗争和实践考验，终于在五十年以后，即祖冲之去世后十年被颁布使用了．而戴法兴所极力维护的南朝豪门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也在农民起义革命洪流的冲击下崩溃了．

二

一切妄图开历史倒车的人都必然是唯心主义者．戴法兴为了反对变革，还祭起了谶纬神学（“谶”是一种迷信的预言，“纬”是一种对经书的解释）．这种宣扬迷信的孔孟之道，早在东汉时期便由王充、桓谭等法家代表人物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并被黄巾农民大起义的革命洪流所扫荡．祖冲之继承了王充、桓谭的唯物主义思想，坚决摒弃谶纬神学，明确指出：“谶记多虚”，“合谶乖说，训义非所取”，这些谶纬之说是虚假的，是不能作为根据的．祖冲之在总结已有历法成就的基础上，“加以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厘，心穷

1）四分历：我国古代的一种历法，定回归年的时间为 $365\frac{1}{4}$ 日，其分数为四分之一，故名四分历．

筹策”，“探异古今”，修正了旧历法的不足之处，制订了新历，证明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来源于实践，而绝不是按天意制造的“图纬”、“谶记”．正是由于祖冲之通过历法的改革直接打击了以谶纬迷信为依据的神权，才遭到戴法兴的强烈反对．

自然界的变化有没有一定的客观规律，是不是可以被人们认识？这是祖冲之和戴法兴争论的另一个原则问题．戴法兴秉承儒家的“天命论”、“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思想，把自然界的一切变化看成是天的意志，认为太阳的运行有快有慢，没有一定的规律，认为天文历法“非凡夫所测”．这是十足的唯心主义不可知论．针对戴法兴不可知论的观点，祖冲之明确指出：“迟疾之率，非出神怪，有形可检，有数可推”．运行的规律是完全可以通过人们观测、分析被认识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祖冲之用新历推算出从宋元嘉十三年至大明三年的二十三年间四次月蚀的时间和月亮在天空的位置，其结果与实际情况很符合．而按照戴法兴所坚持的旧历，则误差较大，“顿差十度”，有力地批驳了戴法兴的不可知论．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戴法兴理屈词穷，哑口无言．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祖冲之正是符合了这条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路线才在历法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这场辩论中，祖冲之继承了先秦法家敢于斗争、敢于创新的反潮流战斗精神．年仅33岁、官职低微的祖冲之，在皇帝亲自主持辩论时，面对以戴法兴为首的显贵们的围攻和刁难，几乎是单身匹马孤军作战．但祖冲之不怕孤立，不怕权势，不畏强暴，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表现了大无畏的英勇气概．

戴法兴千方百计刁难祖冲之，妄图否定祖冲之的历法改革，但又拿不出象样的理由和事实，不是“征引诗书三事皆谬”，便是“寻法兴所议六条，并不造理”．他妄图以诗书、谶记为依据提出六条“理由”，祖冲之一一予以批驳，指出这些“理由”不是谬误，便是谎言．他以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大量天象事实论证了新历法的合理．戴法兴对祖冲之改历的方法和观测的结果又“无隙可乘”，便只好乞灵于帝王圣贤以压制祖冲之，他用《四书》、《五经》的说教来欺骗祖冲之，甚至挥舞起权力的大棒威胁祖冲之．戴法兴引用孔丘的话一再责骂祖冲之．“司历过也”[1]，“此治历之大过也”．说什么须知在古代，有的皇帝出征吃了败仗，便责怪没有选好黄道吉日，而将管历法的人杀了头．戴法兴妄图以此威胁祖冲之．但祖冲之毫不畏惧，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愿闻显据，以穷理实”，“浮词虚贬，窃非所惧”，祖冲之虽然是官职低微的小人物，但因为真理在手，代表新生的进步力量，因而是能够胜利的．而戴法兴所代表的反动保守势力，虽然貌似强大，实质很虚弱，最终是要失败的．

三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我国历史上，反动统治集团总是把历法作为重大施政，如登基、征战、祭祀等的根据，借以宣扬君权神授，受命于天的反动思想，对人民实行统治，推行其儒家的思想政治

1）《左传·鲁哀公十二年》．

路线．维护旧历法，反对变革，就是维护封建神权的重要内容，也是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

处于社会大动荡的南北朝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农民起义连绵不断，朝代更迭频繁．南朝宋孝武帝及其宠臣戴法兴代表最反动、保守的豪门地主阶级利益，鼓吹“天人感应”、“因果报应”宗教迷信思想，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儒家说教毒害人民，以巩固豪门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戴法兴认为祖冲之的新历将产生“名号之正，古今必殊”，”典诰之音，代不通轨”，也就是“名不正，言不顺”，这样封建的名教，儒家的经典就会行不通．这就从反面说明了用新历代替旧历，是对儒家传统观念的有力冲击，触犯了当时统治阶级借以奴役劳动人民的反动思想体系，因而才遭到戴法兴之流的仇恨和围攻．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如果数学上的定理一旦触犯了人们的利益（更确切些说，触犯了阶级斗争中的阶级利益），这些定理也会遭到强烈的反对．”**

和南朝宋孝武帝时期相反，在法家路线占据统治地位的汉武帝时期，却是自上而下地组织了懂历法的人员，进行调查研究，改革旧历，制订了更为准确的新历．这是因为法家代表人物一般都重视耕战，重视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和历法是否准确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他们是历法改革的革新派、促进派．可见，对待历法改革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实质上反映了儒法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是批孔反儒的英勇战士，他对待历法改革问题也表现了更为彻底的革命精神，太平天国制订天历时公然宣称：“从前历书一切邪说歪例，皆妖魔诡计迷陷世人”，“尽行删除”，“年年是吉是良，月月是吉是良，日日时时是吉是良，何有好歹，何用拣择！”“随时行事皆大吉大昌也．”[1]这是对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思想的尖锐批判，批判了旧历法中的神学迷信思想和套在劳动人民身上的精神桎梏，推动了农民起义革命战争，其深远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历法改革的范畴．

祖冲之和戴法兴围绕历法问题的这场辩论，说明在我国历史上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祖冲之主张法家的革新前进的政治路线和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起着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进步作用，而戴法兴坚持儒家复古倒退的政治路线和唯心主义世界观，则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当然，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祖冲之不可能站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对戴法兴的儒家思想进行更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此外，对他自己制订的新历也有形而上学观点，认为应当“永为定式”，这是必须指出的．

研究历史上儒法斗争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对指导当前的斗争是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在科学技术战线上，前进与倒退，革新与守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林彪继承孔老二的衣钵，鼓吹复古倒退，上智下愚，天才论等黑货，妄图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向修正主义歧途，以实现其“克己复礼”的狼子野心，历史已经判定了他们必然失败的命运．今天，我们必须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认真分析和总结历史上儒法斗争的经验，古为今用，以便更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判腐朽的儒家思想，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完成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

1）见《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一册》，神州国光社出版，1952 年．